

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新探

王菡薇

摘要: 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P. 2965)的研究,显示了该卷内容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但是在书写风格、时代特征等方面,仍然有待于深入探讨。本文就是在这些方面的一点努力。

关键词: 敦煌; 南朝陈; 写本; 《佛说生经》P. 2965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10)04-0037-04

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P. 2965)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黄永武《敦煌宝藏》125册^①、饶宗颐《敦煌书法丛刊》第22卷写经3^②、姜亮夫《莫高窟年表》^③、《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④均收录了这本经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记录了写卷识语^⑤,日本敦煌学者池田温先生在《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对该卷识语、收藏地和著录处做了最为全面的著录。该卷识语为(分行与原卷同):

佛说生经卷一白马寺沙门慧湛题记(陈太建八年[五七六])

佛说生经第一

陈太建八年岁次丙申、白马寺禅房沙门慧湛敬造经藏。普被含生同佻性者、开甘露门、示解脱道。愿乘此善、乃至菩提。裂

生死

网、破无明郭。智慧神力、次第开发、入法流

水、成等正觉。回奉十方六道、为无所得故。

藏: P 二九六五 写: 书法丛刊二二卷三七页。宝一二五册四七〇页

录: 二七六页。饶宗颐、书法丛刊二二卷、解说六六至六七页(略)^⑥

从该卷题记中,我们可知这一写本书于南朝陈宣帝太建八年,由白马寺禅房沙门慧湛所敬造。释慧湛为白马寺禅僧,其它已不可考,由于题记中使用南朝年号,故其白马寺应为建康(今南京)之白马寺,而非洛阳、长安等地之白马寺。此后,本经由南京传至敦煌,为人珍藏,直至1002年后不久被埋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偶然发现藏经洞,遂开洞出经,陆续盗卖,本卷即其一也。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上低价购得,携至欧洲,遂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至今。^⑦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中有“此南京遗册,流入敦煌者也。”^⑧

作为书法作品的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无疑是件艺术品,“艺术作品具有文化的特征。艺术史家们的任务像所有诊断专家们那样:去解析意义,去揭露存在于艺术品沉默外表下的一些本质。”^⑨为了深入理解这件艺术品,我们又不得不求助于形式

①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5年,第470页。

②饶宗颐编著《敦煌书法丛刊》第22卷写经三,东京二玄社,1983年,第66-67页。

③姜亮夫著《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0-161页。

④见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2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4-275页。

⑤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有“佛说生经第一,存后半。末题陈太建八年岁次丙申白马寺禅房沙门慧湛敬造经藏,普被含生,同佻性者开甘露门,示解脱道。愿乘此善,乃至菩提,裂生死网,破无明郭,智慧神力,次第开发,入法流水,成等正觉。回奉十方六道,为无所得故。”商务出版社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276页。

收稿日期: 2009-01-22

作者简介: 王菡薇(1973-),女,河北宁河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 美术史论、敦煌文献及敦煌书法研究。

⑥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38页。

⑦参见黄征、江吟编著《敦煌书法精品选》(一)题解,西泠印社出版社,2002年。

⑧姜亮夫著《莫高窟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0-161页。

⑨[美]温尼·海德·米奈著《艺术史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7页。

分析之外的途径去探索。

一 从掌故到书法作品

查敦煌出土写经，没有重复的《生经》写本，可见 P. 2965 是仅存孤本，有着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考《佛说生经》，今《大藏经》作《生经》，共 5 卷，今收录于《大正大藏经》第 3 册（154 号）本缘部上。^①此卷佛说生经第一，据大正本而校，乃属生经卷 2 之《佛说舅甥经第十二》，仅缺开端十几行。《生经》乃西晋敦煌三藏竺法护（Dharmarakṣa）^②所译，说佛及弟子之种种本事本生。《生经》的梵文为 Jātakanidāna，“第一”，频本^③《大藏经》作“《生经》卷第二”，误。《生经》5 卷 55 篇，1 到 12（即本残卷，名《甥舅经》），形式一致，都是先讲一个故事，然后说明其中某人（即某），因而第 12《甥舅经》应属第 1 卷。^④

《生经》讲述了一则舅甥故事。甥与舅俱给官御府，见国库中宝物，贪意为动。一日夜半时，两人凿作地窟，盗取官物。次日，监藏者发觉，告王，王料定盗者会再来，诏属下“勿广宣之”“且严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无令放逸。”舅甥果然又来盗，这次“舅适入窟，为守者所执，”舅身在窟内，头在窟外，甥断舅首，以防暴露自己。国王为了捉甥，想尽办法，先后设下“尸骗”、“女诱”、“子诱”等圈套，而甥总能识破，智慧地逃脱。最后，国王赏识甥的才智，与其言归于好，并招其为駙马。^⑤

①见大正《大藏经》第 3 册（154 号）本缘部上，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第 70 页；书中标注了原本与校本中不同，如“酤”为“沾”、“昔”为“宿”等，第 78 页。

②竺法护，音译昙摩罗刹。西晋僧人。详见李尚全《“敦煌菩萨”竺法护的生平及其佛学思想》，载《敦煌学辑刊》，2004 年第 1 期；该文对中国汉传佛教史上长期争论的竺法护的生卒年问题进行了考证，得出其生年为公元 228 年，即曹魏太和二年，岁在戊申；卒年为公元 306 年，晋惠帝永兴三年，岁在丙寅。并从学僧时代（236-265 年）、译经时代（266-290 年）、草创关河学派时代（290-306 年）三个阶段论述了他翻译佛经和创立学派的过程；介绍了他的佛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的地位。关于竺法护，《梁高僧传》卷 1 有记。《法宝总目录》中有：“竺法护，其先月氏国人。世居炖煌郡。自武帝太始二年丙戌至愍帝建兴元年癸酉（A. D. 266-313）出光赞般若经等。”见《法宝总目录》第一册，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竺法护先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沿途翻译，共译出一百七十五部佛经。参见《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残卷 P·2965 校释》注 1 和 113，黄征撰，载《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10 月。

③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本。

④参见《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残卷 P·2965 校释》注 1 和 113。

⑤详见大正《大藏经》第 3 册（一五四号）本缘部上，第 70 页。校释参见《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残卷 P·2965 校释》注 1 和 113。也参见方一新等著《中古汉

钱钟书先生《一节历史故事，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一文对《佛说生经》中的舅甥故事做了生动的诠释和评说，也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佛说生经》中舅甥故事曾在南亚、中亚、西欧等地广泛流传的事实。钱先生对《佛说生经》的诠释有着典型的钱氏考证风格，通过严谨地考证和广征博引，把这个关于“贼”的故事阐释得有血有肉。先生通过将《生经》第 12 篇《舅甥经》中内容与古希腊大史学家希罗多德《史记》（Herodotus）里叙述的埃及古王拉姆泼西尼德斯（Rhampsinitus）时的一桩“趣闻”和十六世纪意大利马太奥·邦戴罗（Matteo Bandello）《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小说的叙述内容和方式进行对比，显示了佛经和古希腊曾结下的这段文字因缘，得出“《生经》、《史记》、《小说集》显然讲了同一件事”，但叙述的手法又有一些差异，^⑥最终揭示了“掌故”^⑦与“史书”的某种关系：“历史是一个大掌故”（Geschichte ist eine grosse Anekdote）、“剪裁掌故而写成的史书”（eine Geschichte in Anekdote）是最有趣味的艺术品（ein höchst interessantes Kunstwerk）。^⑧

在此基础上，王晓平先生在向人们介绍《韩国汉文小说全集》^⑨时也提到原载于《鸡鸭漫录》的《盗婿》故事，实际上，这个《盗婿》故事出自古埃及，希罗多德写的《历史》^⑩当中，叙述的埃及古王拉姆泼森尼脱王时的一桩趣闻，就是从聪明的盗贼入王宝库盗宝砍掉同伙脑袋脱身开始的。这桩掌故，被海涅采作诗料，《拉姆泼森尼脱王登宝殿》那首诗就是由这个故事改写的。意大利的名著《短篇小说集》里，作者马太奥·邦戴罗“把白描的简笔画点染成着色的工笔画，但对原来的故事线还是贴得紧紧的”，而意大利民间故事《一对贼搭档》和《强盗被盗》都有辗转承袭的痕迹。这桩掌故，能够在亚洲东部“定居”，则是汉译佛典的功劳。西晋三藏竺法护翻译的《生经》第 12 篇《舅甥经》讲的舅甥共盗故事，唐义净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中的舅甥共盗故事，都是这桩掌故的东方版。它们全都具有穿壁、断首、劫尸、女诱、子诱、和解这样 6 个基本情节。这个故事还被收进《法苑珠林》里。^⑪

语读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22-35 页。

⑥详见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载《文艺研究》，1983 年第 4 期，第 4-12 页。

⑦掌故意为旧制旧例；故事，史实。

⑧见《碎金集》（Fragmente）4 部 17 节，米诺（J·Minor）编《诺法利斯集》（Schriften），1923 年第 3 册，第 6 页。也见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注 1，载《文艺研究》，1983 年第 4 期，第 12 页。

⑨林德明编《韩国汉文小说全集》，台北文化大学出版社，1980 年。

⑩钱中书先生在文章中将《历史》一书译作《史记》。

⑪详见王晓平撰《一则从古埃及走到朝鲜半岛的故事》，载

由此可见,《佛说生经》中的舅甥故事一直广为流传,而白马寺禅房沙门慧湛于陈宣帝太建八年敬造《佛说生经》这一事件无疑又是敦煌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

二 作为书法作品的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P.2965)

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距译经时日,约后三百年。本卷佛说生经第一,首残尾全,仅存60行,每行17字,存后半。纵有行,横列未齐对,但一字无差。该卷书体为楷书。硬黄纸,^①有乌丝栏线,卷轴装,墨色晶莹。字里行间之布白,尚称均适得宜。卷末题记,其书风与字体大小,皆与正文无异,风格一致,气势一贯,自然谨肃。字体非隶非楷,行笔缓慢,结体严谨而疏朗,气势开张,风格秀逸,含蓄自然;有实用之便利,而不乏审美之情趣。对早期晋写本那种朴拙、自然的特点有所继承,但更多地吸收了南方成熟的楷书,笔势含蓄,富有创意。顿挫中能看到厚重朴拙。^②

康有为在《广义舟双楫》中有云:“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流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别。”^③虽然康有为在写这段话时,意在陈述当时帖学存在的弊端,倡导碑学;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推断出,南朝写本存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是短暂的南朝陈之写本。

《南朝陈会要》提及陈书学时,记到“后安都工隶书。赵知礼善隶书。蔡景历善尺牍,工草隶。萧干善隶书,得叔父子云之法。萧引善隶书。始兴王伯茂大工草隶,甚得右军之法。毛喜善草隶。谢贞工草隶虫篆。蔡凝尤工草隶。”^④上述书家的书迹已不得见。由此,可知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在书法史和文字史上的巨大价值。考古学家兼历史学

家罗宗真先生认为,在我国考古史上,六朝考古是南方考古的一个重点。西方学者认为,以建康(今南京市)为代表的六朝文化,和同时期的古罗马文化,是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具有民族特色的遗存、文物,就是重要的物证。^⑤从这个层面来看,这样敦煌陈写本也着实是件罕世之物。

焦明晨在《敦煌写卷书法研究》一书中,从书法的角度对这一写本进行了研究,颇有见地。归纳之,第一,此卷书法有质朴自然、不重雕琢的一面,粗细起束,方圆肥瘦,错落参差,极具天趣。结体疏朗,气韵流宕。同时,也有自然有余、精美不足的一面。第二,其中透露出的朴实、稚拙、率真之感与南书传统之流丽清俊迥异其趣。第三,其用笔大抵自然、粗浑,不深究笔法,如:捺笔之表出,中间粗厚,两端尖细,显示出用笔的率性,直起迳收;但又追求圆转腴润之感,似无理之中自有理也,如横画之粗细长短,虽无一定,然细审之,仍可理出脉络。结体美称守律,虽各有态势,却能方寸不离,字字清辨。第四,有些笔法在当时书写习惯中较为少见,卷中当横勒为主笔时,往往延长,如“女”字、“者”字、“其”字、“前”字、“吾”字等是,且笔在运行时,就之提顿而中间不着纸,遂成断笔,如题记末行“所”字等。而“走”字旁写法,乃是本卷醒目特色,竖向以简单两笔带过,旋即右转走笔收锋,简便远捷,第五,虽造型不甚佳美,惟富简洁天趣。如诸“遣”、“还”字等是。总之,与严谨写经相较,自是不及,惟天然意趣,则过之云耳。^⑥(图片见文末)

事实上,这卷陈写本与近时书迹高肃碑(五七五年)和小铁山匡喆刻经颂(五七九年)相比,毫不逊色。高肃碑,北齐武平六年(五七五)立。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出土于河北磁县南刘家庄。揭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高肃碑为隶书,浑穆端实。铁山刻石又称《小铁山刻石》、《匡喆刻经》,位于山东邹县城西北角。刻石上方有阴线刻巨龙、云气、佛光图案,佛光下镌字,右侧刻佛教《大集经》,左侧刻《颂文》,经文下部刻《题名》。《石颂》部分,位置在经文左侧。颂文工整华丽,极富文采。体在隶楷之间,飘逸宽绰。颂文记述了经主匡喆及他人集资刻经、经文字数、祥瑞图案诸事。书风极具特色,书者当是安道壹弟子。^⑦体在隶楷之间,飘逸宽绰。线条形态,基本上用中锋、藏锋为之,线条的质感归宿于含蓄、浑穆、简练,富有张力。其线条形态也呈现出俯仰起伏、伸缩屈曲的变化,但

《中华读书报》,2009年2月13日。

①《齐民要术》云:“硬黄纸,味苦,益以黄蘗染成云。”硬黄纸纸质细密,防蛀抗水,颜色美观。

②饶宗颐《敦煌书法丛刊》第22卷写经(三)解说部分(东京二玄社,1983)、赵声良《南朝写本〈佛说生经〉》(载《敦煌书法库》,第二辑,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第174页),黄征、江吟编著《敦煌书法精品选》(1)题解中均有对此卷书法的评分析。

③《广义舟双楫疏证》尊碑第二,华正书局,1985年,第14页;紫溪先生认为,现存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丧乱帖》等,虽都是墨迹,胜于石刻,但书法神采、亦近似唐人。见《由魏晋南北朝的写经看当时的书法》,载《文物》,1963年,第3期;也见《中国敦煌百年文库·艺术卷(一)》,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④[清]朱铭盘撰《南朝陈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

⑤罗宗真《六朝考古》前言部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⑥焦明晨著《敦煌写卷书法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78-80页。

⑦《邹县北朝摩崖刻经》,邹县文化局编撰资料;关于刻石情况,详见赖非著《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128页。

横画一般驻笔收势，绝少隶波。其隶波往往施之于捺画。此外，短促的横画、竖画常常施之以肥笔，但多是笔画简单的字，如“一”、“大”等。转折处，寓折于转，不抛筋露骨，筋力隐含不外跃，“写经体”转折处皆如此为之。^①康有为评之为“浑穆简静”“多参隶笔”。^②与之相比，《佛说生经》残卷则朴实率真，圆腴疏朗，“置诸其间，可与齐等，而无愧色”。^③

刘涛在《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中也提及《生经第一》，认为此卷的字法与稍晚的陈《摩诃摩耶经卷上》写本相似。抄经者用笔轻捷，起笔多尖细，不作顿按，钩笔是轻盈地挑出。笔画形态是肥腴而曲张，结字宽缓平和，不如梁朝《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楷法那样严整。^④《摩诃摩耶经卷上》写于至德四年（五八六），晚此卷十年，其用笔、结体、书风等，皆与本卷有相似处。

三 从书法作品到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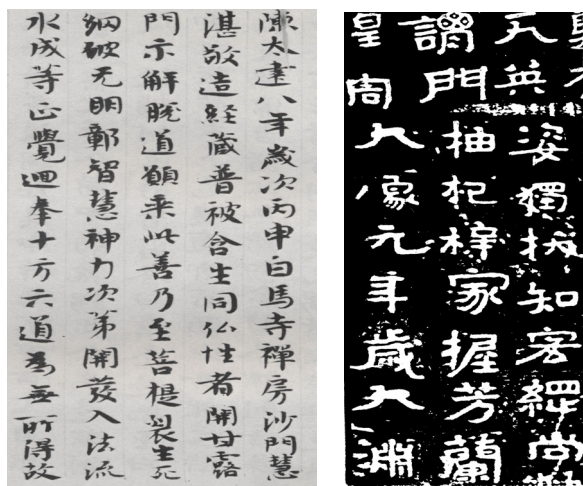
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书法稚拙、自然，“方圆肥瘦，错落参差”，富于天趣。然其中又诸多俗字和别字。书法与文字休戚相关，应理清为是。同时，文字又不仅之于书法有意义，对字句的理解也非常重要。上述钱钟书先生文章因所用为《大藏经》通行本，有些字词也未能订正，显得有些许遗憾。^⑤由此，将《大藏经》通行本与敦煌陈写本相比照，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黄征教授《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残卷伯二九六五校释》一文对《佛说生经》做了详尽校释。^⑥在校释的过程中，通过比对，我们看到传世文本有多处错误，如“酒宗”实为“酒穴（肉）”之误，“鸣”实为“呜”之误，皆可据以校正。^⑦且文中解释了钱中书文章中的一处疑异。《生经》有：王诏之曰：“勿广宣之，令外人觉。舅甥盗者，谓王多事，不能察觉；……”钱先生说：国王在“诏”里说明“舅甥盗者”，而舅甥曾“给官御府”；按理两人都是有姓名、有着落的，国王只消派差役拘捕，不就干脆完事了？他偏巴巴得等贼上门。故事虽因此免于流产，情理上很说不通。^⑧黄文就同一问题校释为：“舅甥”二字似为叙者所加，因为下文

有“甥捉不制，畏明日识，辄截舅头”等情节，似乎官府起初并不知盗者是谁。^⑨黄文更指出很多别字和俗字，如“儻”为“舞”的别字、“愍”为“总”的俗字、“啓”为“启”的俗字，“答已蚺维”中“答”为“若”之形误，等等。^⑩梳理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的书法价值，就必须理清这些错字和别字。至于书写者写这些错字和别字是否考虑到形式因素，还有待研究。

综上，无论是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是书法价值，伯二九六五《佛说生经》残卷（P. 2965）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这件作品兼具文献学上、文字学上和书法上的独特性，所以，真正理解它，需要多角度地去阐释，这样，包括史学、文字学、文献学、形式分析等阐释方法和研究成果均被无形地纳入艺术史研究中，从而也促成了除了解释“空白的知识”^⑪以外的艺术史的另外一个注释作用，即，在兼容各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多角度阐释，这是艺术史研究有别于其它学科的重要特点。敦煌陈写本《佛说生经》残卷（P. 2965）自1900年王道士令其“再生”以来，诸学者的研究共同诠释和构成了艺术史研究的多角度性和兼容性。

然而，对于这一写本，仍有诸多疑义，如《佛说生经》中用字与书法表现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慧湛究竟是谁？这本经卷从南京流传到敦煌中辗转经过哪些人之手？慧湛为何要抄《佛说生经》？为何后世抄经者都对这部经视而不见？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他文做进一步论述。



（责任编辑：陈剑）

①《关于〈四山摩崖〉及其书法的初步考察》，阿涛撰，载《四山摩崖刻经》，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10-11页。

②《广艺舟双辑·余论第十九》。

③焦明晨著《敦煌写卷书法研究》，第80页。

④刘涛著《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6-297页。

⑤《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残卷P·2965校释》，第290页。

⑥《敦煌书法精品选》（1）题解。

⑦《敦煌书法精品选》（1）题解。

⑧钱钟书《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载《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10页；

⑨见《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残卷P·2965校释》注9，黄征撰，载《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⑩见《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残卷P·2965校释》注32、33、35，黄征撰，载《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

⑪详见拙文《知识的空白——论艺术史的注释作用之一》，载《新美术》2003年第3期。